

希伯来语圣经研究的范式更新

评陈贻绎《希伯来语圣经——来自考古
和文本资料的信息
(至公元前 586 年)》

Paradigm Shift in the Study of the Hebrew Bible
——On Y. Y. Chen's *The Hebrew Bible, an
Introduction Based on the Textual and
Archaeological Data (till 586 B. C. E.)*

祝 帅 北京大学

Zhu Shuai, Peking University

370

[Abstract] Dr. Y. Y. Chen's *The Hebrew Bible, an Introduction Based on the Textual and Archaeological Data (till 586 B. C. E.)* launches a new historic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the Hebrew Bible by applying the "dual-evidence" method to primary sources, namely, incorporating both the Hebrew language and the archaeological data from the Near East. Compared to the many existing "Introductions to Old Testament", Professor Chen's work amounts to creating a paradigm shift. His work distinguishes itself by its wealth of illustrations and skillful organization of materials using the dual-evidence method, which integrates text, material culture and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o bring to life the world of the

基督教文化学刊(第 18 辑·2007 秋)

Bible. While no book is perfect, this one should be applauded as a superior attempt by a Chinese scholar, who is new to the arena of religious studies.

尽管上世纪末中国高校曾经出现过一阵不小的建立宗教学(特别是基督教研究)专业的热潮,但相比较其他热门学科而言,圣经研究在中国从未成为显学。这一方面体现在教会体制之外的基督教研究,由于缺乏信仰和文化背景的依托,使得无论就数量还是质量而言,短时间内仍然不可能与国外的研究水准相抗衡;另一方面,对于相当一部分中国的宗教学者来说,语言的隔阂已然成为阅读第一手文献的最大障碍。就圣经而言,新约部分的原文古代希腊文已经通者寥寥,旧约主要部分的原文希伯来文更是令国人陌生。对于一项贴近文本的学术研究而言,只能依靠翻译和其他二手文献来进行研究,无论如何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圣经研究又是开放的。由于圣经本身的包容性,对于圣经的研究已经远远不局限在“宗教学”或者教会体制的“神学”研究有限的范围内,而是可以拓展到哲学、史学、文学、法学、考古学、社会学、艺术学等多个领域。几乎可以这样说:无论信仰与否、无论是否具备宗教学的学术背景,作为文本的圣经永远是对一切对它有兴趣的人开放的。其他学术背景将会极大地丰富中国的圣经研究,使其具备“百家争鸣”的特色,然而这种极具吸引力的交叉学科圣经研究目前在国内还是很欠缺的。尽管目前国内出版的原创性圣经研究学术著作还多数出自宗教学学者之手,但随着更多年轻一代研究力量的加入,这种学科奋兴的局面似乎也指日可待。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陈贻绎博士的《希伯来语圣经——来自考

古和文本资料的信息(至公元前 586 年)》应运而生了。陈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希伯来语言文学专业(学士)、康奈尔大学近东研究专业(硕士)、及康奈尔大学圣经研究科(博士)。本科的专业学习使其具备得天独厚的希伯来文一手文献——即旧约^① 原文阅读的能力,而留美的学习背景使其对于旧约时代的耶路撒冷地区的考古资料及圣经研究的方法并不陌生。应该说,这种独特的学术背景在目前国内宗教学界还是“得天独厚”的,而陈博士更是以其独特的学术积累全力投入《旧约·圣经》的研究,在国内有限的学术资源和研究条件之下,向对于古代以色列并不熟悉的中国读者奉献上这本精心结构的专著,其成果质量自然更加引人注目。

出于对于陈博士学术背景的仰慕以及对于圣经文本与物质文化研究的兴趣,笔者拜读了陈博士的这部专著。相比较国内教会内外的学者此前的研究范式,以及笔者所见有限的国外《旧约·圣经》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陈博士的著作在如下几个方面别具特色。

372

一、解读希伯来语圣经的 “二重证据法”

曩者,海宁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总论》中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他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新材料,我辈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

^① 在该书中,对于从《创世记》到《玛拉基书》的 66 卷基督宗教与犹太教的共同经典,作者为尽力避免宗教色彩而不取基督宗教的“旧约”,而采用更为客观的“希伯来语圣经”(或“希伯来圣经”)。而本文则考虑表达习惯,在个别地方仍将使用“旧约”以与“新约”相区分。

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行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以断言矣。”此后，国内的学者纷纷尝试效仿，或者把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材料加入称为“三重证据法”，但总的说来，尽管这种研究方法在史学界已经屡见不鲜，但在国内应用于圣经文本研究的尝试还并不多见。一方面，宗教学、神学领域的研究者的兴趣大多集中在考据和思辨，对于实物的田野考察和研究极少涉猎；而另一方面，历史学、考古学领域的学者对于圣经又极为陌生，面对众多中东地区的考古和物质文化资料，却形成“懂的人不搞，搞的人不懂”的尴尬局面。

陈博士的著作却兼顾了这两个方面。该书在概要介绍了学术界常识性的“五经底本说”之后，行文便围绕以色列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逻辑地展开。其中，每一个章节几乎又都可以粗略地分为“考古发现”和“圣经文本”两大部分。前者详细地讨论了从有陶新石器、铜石并用、青铜器到铁器时代结束的考古发现，随后对应不同时期希伯来语圣经的记载相互印证。在作者看来，这种结构方式的前提是一种历史的对待圣经的态度，即既不赞成圣经（当然在本书中特指的是希伯来语圣经——即基督宗教圣经的旧约部分）的记载“句句是史实”，也不赞成历史研究中不使用圣经所提供的任何材料。然而由于“我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所以“对于希伯来语圣经中的非传说性历史事件，我们只要觉得可信可疑，就还是采取宁信其有的态度。”

几乎任何一个古老的文明都有记载自己历史的经典流传至今，而希伯来语圣经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以色列的上帝雅威（旧译耶和华）借助人手笔写作的，因而历来在非信徒（包括犹太教徒和

基督教徒)之间总是引起人们理性的怀疑。换句话说,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中提出的“疑古学派”式的学风,在圣经研究中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

那么,希伯来语圣经的记载究竟属于“信史”吗?倘若把《创世记》前11章无法验证的部分暂且搁置不论的话,整部旧约历史书其实记载的都是以色列民族的历史。然而,人们总是愿意质疑这部历史著作的可信性,原因就是对应的很多历史时代,除了圣经之外并没有更多的记载——这大概也是犹太史家约瑟夫的著作之所以受到重视的一个客观原因。但实际上,人们却很少质疑同样记载了很多神话、很多通过“全知视角”叙述、却坚定地被认为属于“信史”的《史记》。法学家苏力曾指出,“这样的《史记》显然是不真实的,至少不可能证明是真实的。我们仍然坚信《史记》是信史。”^① 念及这一点,再联系中国读者对于圣经的种种偏见,不得不承认陈博士的“历史的姿态”的确有客观、公允的一面。陈博士所采纳的,正是一种不同于这种“怀疑的释经学”(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的“认可的释经学”(Hermeneutic of Assent)姿态。带着这样的态度进入希伯来语圣经文本的时候,也确乎多了一层“同情之理解”。

历史研究只能建立在对于史料记录者的“信任”的基础上,否则,无论是中国的“疑古学派”还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都只能从方法上对传统的历史研究形成新的挑战,这种挑战有可能作为一种理论或方法令人耳目一新,却恰恰不能够为历史本身增添更多的“知识”。当然,即便我们承认希伯来语圣经是一部信史,也并不妨碍继续使用“二重证据法”来丰富我们对于以色列民族史的直观

^① 苏力,《法律与文学》一书中的有关分析,北京三联书店,2006,第312页。

理解和感悟,但是有必要提醒的是,考古发现本身是零碎的,而且考古发现的材料也并非总是可信的,因而其在历史研究(而不是作为艺术学式的本体研究)中的价值也并非绝对。如同作者所指出的:“虽然考古发现和希伯来语圣经中的摩西五经之间有一一对应的密切关联的地方很少,但是也没有考古发现和希伯来语圣经中的记载和描述产生明显矛盾的地方。尽管考古发掘无法为我们证明摩西五经的历史真实性提供佐证,但是给我们提供了对这块土地上相应时期的地理和人文环境的大量信息,这些信息对于我们理解摩西五经故事所处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考古资料并不具有历史线索的自足性,它们必须同相对可靠的文本资料(包括考古发现的文本资料)结合起来使用才能够建立起我们关于历史的知识,这是陈著所意识到的一个重要前提。

二、希伯来语圣经文本 研究的历史视角

如上所述,陈博士具有东方文学研究的学术背景,但他对于希伯来语圣经的研究却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换言之,对于宗教学界流行的“高等批判学”和“低等批判学”等文本研究方法,他并没有表示出较高的兴趣,而是结合自己的考古学研究尝试了一种研究希伯来语圣经文本的历史视角。显然,这种“历史视角”是一种宏观的说法,它涵盖了出于史学立场和方法对于文本的文学和宗教学研究。作者对于《旧约·圣经》故事的文学背景介绍与主题分析,以比较神话学的方法对于古代近东地区文学作品母体的比较研究,以及对犹太律法与《汉谟拉比法典》的精彩对比等,都体现出纯粹宗教学领域的学者著作中不容易发现的独特历史视角。更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用相同的篇幅以“导论”的方式一一介绍希伯来语圣经的每一卷书,而是把《摩西五经》、《士师记》、《撒母耳记》和《列王纪》等史料价值最高的书卷置于作为上帝选民的以色列从先祖到民族形成、成长、王国兴衰的整个历史线索中去,在此线索中分析每一卷的历史信息与文本问题。

一般而言,对圣经文本的研究集中在经文注释—分卷概论—圣经神学几个渐次升高的层面,而其中第一和第三层面的著作又相对集中于教会和神学院体制的作者和读者。至于以往国内学者对于希伯来语圣经概论性的研究与介绍,或集中于其中的“圣经故事”的文学阐释,或侧重于对于每一卷书详细的历史与文本介绍。应该说,这种按卷编写的概论有其独到的特点,比如有利于引导读者在短时间内对于圣经整体形成一个全面的了解等等,但其中无论哪一种方式,都难免使读者难以形成对于以色列民族完整的历史认识,或是往往纠缠于其中的细枝末节与经文片段。而专治以色列史的学者却又往往过于脱离圣经文本本身。这就使得长期以来国人对于圣经和以色列史的关系多有误解,也显示出一本按照主题发展线索编写的圣经研究专著的必要。此外,陈博士具备阅读希伯来语圣经原文的能力,在处理相关问题上可以不借助于汉语圣经的翻译,因而有可能从原文出发真正做到建立汉语语境中圣经研究的新的学术范式。

对于国外大量希伯来语圣经研究资料的吸收与介绍也是陈著在“文本”部分的一大特色。在从对于“五经四源说”的引进开始,到《创世记》前 11 章所反映出的希伯来人宗教观,直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具体日期的推算等重要圣经文本问题的讨论中,作者引用了西方(尤其是英语世界中)20 世纪以来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从书后所附多达 40 页的西文参考文献中也可可见一斑。尽管熟悉

圣经研究的国内读者对于这些成果的大体结论很可能并不陌生，但如此详细的对于这些成果一手文献的综述与介绍，很可能别具参考价值。故此，尽管在专业读者看来，有可能陈著对于圣经文本的描述（特别是对于故事梗概的介绍）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常识”性的，似乎不应该出现在这本具有一定深度的学术专著而非教材中，甚至由此显得该书内容稍有驳杂之感，但笔者相信其中所带出的大量信息，对于细心的读者在此基础上从事进一步的希伯来语圣经专题学术研究，还是提供了很多无微不至的“按图索骥”的可能。此外，图、文并茂也是陈著的另一特色，其目的是让枯燥的文本不断形象化、立体化。在圣经研究中引入图表的做法，至少在国内宗教学和神学界的学者们中间还没有形成风气。但作者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并作为书中插图的图像资料，的确为身处内地的读者进入并感受、触摸历史提供了种种便利。

当然，似乎也有必要指出作为一本圣经研究的专著，作者留给圣经文本的篇幅本来就不多，而其中有穿插了大量的如“五经底本说”，甚至故事梗概等对于专业读者来说过分偏重于常识性的描述，尤其是文本中直接引用或解释希伯来语圣经原文的部分似乎还可以再增加一定的篇幅。因而该书文本部分似乎更像是教材而不是专著的写法，这就使得作者除了倚重的是西方国家的一手研究资料之外，并没有提供太多个人独创性的新见解。此外，对于希伯来语圣经中的非叙事部分，特别是大量先知书和《诗篇》、《雅歌》、《传道书》等等，作者并没有在“历史视角”下给予足够的重视。此外，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基督宗教圣经的新约部分兴趣不大，而是投其全力进行犹太教和基督宗教经典共同部分的旧约即希伯来语圣经部分进行研究，而众所周知，基督教信仰和教义最为精华的核心恰恰在于新约部分，这从仅仅熟悉旧约的研究者往往很难建立

起基督教信仰这一点上更可以看得清楚(尽管这对于圣经研究来说不是必需的)。这一方面使得作者对于基督宗教所坚持的圣经的完整性与犹太教的区別未加以讨论,囿于一端而无法窥见基督教圣经的全部面貌对从事基督宗教研究来说毕竟是不利的;另外一方面,也有可能在此表面的“平等”、“科学”的态度之下形成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偏见与误解。

三、圣经研究视野中的物质文化史料

通读陈著之后不难发现的是,尽管作者主要处理的希伯来语圣经的文本问题,但实际上作者更多的篇幅是用来利用考古资料从外部谈论圣经文本的信息。作者对各个时期巴勒斯坦地区的社会生活、贸易、技艺等等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为我们提供了与圣经文本相互印证的丰富的图像材料。除此之外,作者甚至还设置了单独的一章来描绘“以色列物质文明的主要特征”,以此作为前面章节中涉及考古材料的部分甚至全书的总结。在这一章里,作者主要关注的是古代以色列的建筑规划、宗教遗址、工艺美术、器具制作、文字和葬俗等方面,从而展开了一幅生动的古代以色列生活风情画卷。

长期以来,“物质文化史”这个研究领域在国内还是作为历史学或考古学的一个门类来进行研究的,它同博物馆学尤其是文物的关系更为密切。1954年,沈从文第一次明确地从方法论层面表现出一位文物学者介入“文史研究”的信念。沈从文通过大量的实例批评了那种通过“集释法”研究古典文献而忽视与实物联系的做法,指出“新的文史研究,如不更广泛和一些有关问题联系,只孤立用文字证文字,正等于把一桶水倒来倒去,得不出新东西,路是走

不通的。”^①此后，考古学界的俞伟超在马林诺夫斯基的基础上立足考古学研究的视角进行了发展与丰富：“通过这样一些物质遗存，能够看到的東西，不仅是古代的生产能力，还有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以及社会组织状况。这就是说，马林诺夫斯基所概括的物质底层、社会组织、精神文化这三个因子，都可以进行探索。”^②联系前面提到的“二重证据法”，这些论断都可以看出考古学、文物学者对于考古资料进入文史研究（当然也包括圣经研究）的信心，而对此圣经研究界的学者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联系物质文化研究希伯来语圣经的做法，在海外学术界早有尝试，而国内的研究者对于犹太的物质文化本身也并不陌生。早在1996年，上海三联书店由顾晓鸣先生主编的《犹太文化丛书》中，就收录了陈超南先生编著的《犹太的技艺》。但作为国内学者建立在一手文献基础上原创性的学术成果，如此丰富的文本与图像资料的结合，很可能陈贻绎博士的著作是第一次与国内的读者见面。然而，圣经学者进入物质文化的研究领域，除了语言、地理等原因造成的资料困难之外，还有几层固有的难处：一是对于以色列史和考古材料要有全面而充分的掌握；二是解读物质资料所涉及的大量文化人类学、工艺技术甚至艺术学等方面的背景信息；三是如何使得所利用的材料紧密地结合希伯来语圣经自身所提供的文本，避免落入“就材料谈材料”的局面。如果说，陈著在这前两点上具备了一定研究基础的话，那么在第三点上，即图像材料和文本材料的相互印证方面联系得还不算非常紧密，这使得全书“文本”

^① 沈从文，《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北京译文出版社，1998，第19页。

^② 俞伟超，《文物研究既要研究“物”，也要研究“文”》，《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134—135页。

与“材料”两部分尽管互相交织、各自内容丰富,但却多少有些孤立。

在很大程度上,各种文本与图像资料尽可能的丰富,也许正是作者所追求的一个目标。作者看到,在西方“当数据的质和量都达到一定的要求和标准时,才可以下一个肯定或者否定的结论;而当数据力度不够时,是无法轻易下结论的。”“和许多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相比较,希伯来语圣经研究的数据和信息并非那么充足,所以在许多方面还不宜过早地下结论。”的确,严格的社会科学研究分为定量研究和定性(定质)研究,由于“定性研究”较少数据与统计的参与,因而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也并不旨在提出某种通则式的结论。事实上利用严格的定性、定量方法对于圣经文本的研究在西方已经开始起步,一本在英语世界享有盛名的社会研究方法教材,在介绍利用计算机进行“内容分析”的方法时,就列举了用 NUD * IST 软件来分析《利未记》的研究范例,但这种侧重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宗教学界几乎还没有人来使用。^①

但严格地说,并不是所有侧重于历史、文本的研究都是社会研究中的“定性研究”,相反,人文学科领域内的研究成果还需要用人文学领域内的方法加以检验和批评。无论如何,圣经研究已经正在从一个学术领域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既作为一门学科,论者就不能仅仅停留在“资料长编”的准备工作阶段,而是应该有自觉的撰史方法和体例设计,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史识”意识。举例来说,中国现代史上第一部哲学史并非胡适的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而是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但是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中,关注更多的自然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而不是谢著。在文学史方面,

^① [美] 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第 10 版),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第 373 页。

周氏兄弟之前更是早已有陈子展、钱基博(钱钟书之父)等人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但今天仍然能够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无疑是《中国小说史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而不是陈、钱二位之题目更“宏大”的著作。其原因很好理解：关键看论者是把书当作史家著作还是“资料长编”来经营。因而，如何充分发挥考古材料在圣经研究中的全部价值，在大量丰富的材料之中融入自家的“史识”——提出个人独到的观点与分析，也是陈著中有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结 语

今天，对于一部在希伯来文原本和西方世界研究资料两方面都具备“一手文献”基础的希伯来语圣经研究专著来说，陈博士的视野和研究方法在多个方面，已然在经文注释、圣经概论之外开辟了圣经研究的一种新的范式，其成果应该在国内宗教学界受到充分的重视。也许诚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表述的那样，对于这样一部“发凡起例”的著作来说，作者当然不会奢望去解决一个新兴学科发展过程中的全部问题，而是重在借鉴与引导，呼唤更新更好的独创性成果在国内圣经研究领域不断涌现。无论如何，陈著的确是近年来国内圣经研究领域的一部构思新颖、结构独特的作品，其对于一手文献的娴熟运用，以及对于考古材料的全面描绘，加深了国人对于基督宗教的发源地——古代东方地区的了解，也促使人们设身处地地思考基督宗教从东方向西方传播扩展(而不是相反)的整体历史进程，而作者独特的学术背景更是为国内的圣经研究开辟了新的学术空间。这一切都预示了今后国内的圣经研究将有可能呈现的崭新思路与独特面貌。